



本期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瑜 校对:胡建宏

高亚东: 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马栏医生

贺聚宁 计盼静 叶明亮

人物

马栏时期,关中分区不仅涌现了革命医师张治平、模范中医任和平等一大批医术精湛、深受群众信赖的老中医、好大夫,还有一批年轻的医务工作者奋战在救治群众的第一线。位于马栏的关中分区驻军门诊部的医生高亚东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4年5月28日,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关中医高亚东同志热心为群众服务”为题,做了专题报道。

高亚东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斗争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革命前只念过四年多书。从民国二十四年起,他就参加红军当看护,一直从事医务工作。1944年初春的四个月中,25岁的高亚东已经给机关、部队和群众看病三千多次,他非常细心负责,成绩显著。二月间关中分区司令部的一个女同志得了很重的病,请高亚东去医治,他白天在驻军门诊部给病人看病,晚上去给这位女同志诊治,就这样没有白天黑夜地工作了半个多月,当那位女同志病到最危险的关头,高亚东整整有一个星期没好好睡过觉,而且抽自己的血输给病人,最后这位女同志的病情得以好转。

在高亚东医好的病人中,老百姓占了绝大多数。大部分老百姓都是跑到门诊部来看病的,高亚东总是很和气地接待他们,有些群众不知道看病的手续,没有带区乡政府的介绍信,他经过简单询问调查后,耐心细致地给群众诊断、开药方。马栏区金盆村一个新来的难民,得了眼毛倒卷病,开不成荒,十分焦急,高亚东给他看了两次,眼睛就好了。另一个病人,鼻子上生了一个大瘤,高亚东给他开了刀,不久就治好了。有一次,高亚东有事去马栏街上,遇见了鼻子生瘤的人,此人一定要拉着他去吃一顿饅饅表示心意。石底子新来的难民老郭得了传染病,连他老婆都不愿跟他一起吃饭,老郭在外面请医生看病,打一针“六〇六”要花很多钱,病还是治不好,后来他到门诊部找高亚东,住了一个星期医院,打了三针“拍夫拉文”,疮口就收缩了,高亚东没收他一分钱,老郭非常感谢。有次老郭给高亚东送来肉和鸡蛋,高亚东留他一起吃饭,老郭再三推辞,后来高亚东硬拉他坐下,老郭说:“先生讲卫生,还不嫌我,真叫我感动!”老郭看见高亚东吃了下午饭还要到地里去开荒地,他把锄头抢过来说:“先生,你要治病,还能开地?哪有这样的先生。还是叫我给你开吧。”老郭最后给高亚东开了五分荒地,还说要常来看他。到门诊部看病的老百姓,最远的有从赤水、淳耀来的。淳耀柳林的一个病人说:“咱这里看不好,就到马栏去看。”老百姓都相信公家医生看病有办法。

关中分区驻军门诊部人少,不便出诊。有次马栏风子梁的老百姓来,说梁上有好多病人,要请高亚东医生去看看,高亚东立即就去了,到风子梁山脚下,就有很多农民在远远地迎接他。高亚东出诊,在子午岭的山里跑了三个村子,每个村子都有许多人请他去家里看病,家家都给他准备吃的,山东人、河南人、陕南人还都做着他们本地的吃喝来招待他。这天高亚东看了十几个病人,其中患轻感冒的最多,高亚东给群众开了药方、留了药才离开。

1944年开春,马栏的老百姓急着找人给自己的娃娃种痘,街上有些卖狗皮膏药的医生乘机骗钱,一个娃娃种痘要一斗麦子,女孩八升,于是门诊部叫高亚东去给娃娃们免费种痘,马栏小学和校外的80多个娃娃都顺利地种好了痘。

由于高亚东热心地为群众服务,所以来请教他和到门诊部看病的老百姓就越来越多,《解放日报》评价:“他做这个工作从来没有不安心过,而且对上级的命令和指示都是叫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他在医务和文化上都有飞跃的进步,但他却从来没有骄傲过,今年他看过的许多病人中,有五个人得病,因他学识和经验的限制不敢轻易诊断,他就把他们介绍给医院院长,并向他虚心地向他学习。高亚东同志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是值得表扬的。”

跳动着文明密码的岳坝

肖景峰 曹庆 王琪

胜迹

汉中佛坪县岳坝镇全镇辖域背靠秦岭主脊,地势为“M”字形,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与宝鸡太白县相连,北部以秦岭主梁为界与西安周至县相邻,西部和南部与汉中西乡县接壤。境内是汉江一级支流——金水河的源头区,峰峦叠嶂、溪流纵横。全镇森林覆盖率达95%以上,拥有大量的原始森林,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物基因库”。

第七批陕西省历史文化名镇——岳坝,如同一座活的博物馆,将古道文化、传统民居、原始农耕、红色记忆编织成秦岭最动人的文明密码。

古道有遗韵

说起岳坝,必然绕不过饶路古道。饶路道在连接关中平原与汉中盆地之间的诸古道中,是最为便捷也最为艰险的。初始于商周,秦汉时期完全形成,正式开通是在三国时期,隋唐时最盛,沿途廊道众多,十里一驿,三十里一驿。如今,古道路基尚存,当初以黄桶梁作为驿站的黄桶梁街道,仍保留着石板铺就的街面。东河栈道较为平坦,是饶路道的一

民居现繁华

位于岳坝镇政府驻地一带的何氏民居,现统称为何氏古建筑群,被列为第五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

何氏一族的故事在岳坝一带家喻户晓。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徽商何氏一族陆续从安徽省六安市霍山迁入陕西,在饶路道从事商贸贸易。相传何氏家族通过药材种植等完成财富积累,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从安徽老家请来工匠,选址岳坝,修建徽派风格家园。最先建成的是厅

通义坊里的边家村

冯兆龙

属于通义坊有关。行走通义巷,望着两边的高楼,看着整洁的街道,我遥想当初这里的喧嚣和拥挤,感叹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边家村在唐代属于通义坊。这里曾是唐高祖李渊的龙潜旧居,也是唐高祖的四亲庙之地。唐时,上层社会流行舍宅置观,为已故的人追福,为在世者祈福。当时皇帝把先帝宅,自己在蒲山邸,外家宅宅及官宅多舍为观。唐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就把唐高祖李渊在通义坊的“龙潜旧宅”改为兴圣寺。唐睿宗李旦的女儿薛国公主(又作蔡国公主),也曾居住于此。通义坊也曾是右羽林大将军李思训、朔方节度使李进贤的府宅。既是唐代杰出画家又是著名政治家的阎立本也居住于此。作为画家,阎立本为唐太宗画过像,著名的“昭陵六骏”图样就是阎立本杰作的。作为政治家,他官至宰相,位极人臣。由此可见通义坊在当时是何等显赫。

说起村名的来历,边家村原村干部雒学建介绍,传说唐朝时,这里曾是一个姓边的将军的庄园,边氏后人一直居于此,久而久之,人们称为边家村。宋以后,有边、谭、刘三大姓氏在此居住,人们又将此地称边谭村或边谭刘村。后来在清同治年间,这三个姓氏逐渐离散,只剩下边姓一户,住在村西墙外浦家巷,人们又改回边家村。随着岁月流转,人员聚合迁徙,

边姓人家于民国初期也离开此地。现如今,边家村已无边姓,主要有姚、郑、薛、廉、雒、芦、王、陈、钟、冯等姓氏。

94岁高龄的雷金贤曾当过多年的村妇女主任,她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边家村主要有三个巷子,分别是中巷、南巷和北巷。北巷也叫北村,主要居住着王、雒、谭姓人家,读书人、生意人、开铺子做买卖的居多,经济较为富裕。

北村冯姓是关中大火冯从吾的后裔。冯从吾是明长安(今西安)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由进士入仕,官至御史,因疏神宗失政而被罢官还乡。归乡后,潜心于宋儒理学,著书立说,并讲学于宝庆寺。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在地方官员的协助下,创办了著名的关中书院,讲学议政,弘扬学术之风。天启七年(1627年),权宦魏忠贤干政时,他遭到削籍处分,所建书院也被拆毁,忧愤而死。死后葬于故里,墓地在今天边家村陕西省公路局职工医院院内。其后人冯志远于民国九年(1920年)创办了启智小学,并担任首任校长。

今天的大学南路小学是一所省级示范学校,也是西安市首批一级小学。然而,你也许想象不到当初的启智小学便是大学南路小学的前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黄雁村、边家村和张家村的孩子都在城内上学,路程相对较远。三个村子便商议共同

出人叫作“花房子”。

红魂耀千秋

岳坝是一块英雄的土地,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转战途经佛坪,在这块荒僻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七十四师及宁佛工委、陕南抗日第一军坚持根据地革命斗争,在这块土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英勇的革命军队与坚强的佛坪人民并肩战斗,红二十五军在佛坪期间,在岳坝镇境内的狮子坝村、栗子坝村、女儿坝村、大古坪村留下红色印记。

革命军队走到哪里,就把革命思想的火种传播到哪里。狮子坝村戴世禄家院子围墙上刷写有标语两幅,第一幅内容为“红军是反帝国主义先锋队”,第二幅内容为“红四方面军占领陕南”。一户农民家中,至今还珍藏着红军送给他的扁担、米袋、香皂盒等日用品。

新时代,勤劳勇敢的佛坪儿女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继承先烈遗志,弘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积极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出资出地,将原先的启智小学扩建为“黄边张小学”,使附近的孩子能够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黄边张小学的学校址就在现在红缨路最南口的三官庙。20世纪60年代,陕西省财贸干校将三官庙作为校址后,黄边张小学迁到了现在的邮电南巷。几年后,又被迁到现在的大学南路,这就是大学南路小学。

今年73岁的雒秋霞就嫁在本村,她说,原先村里还有一大一小两座庙。大庙在村西北位置,也叫“北极宫”,小庙在南巷里,也叫“无量庙”。大庙占地20多亩,是当时南郊香火较为旺盛的庙宇之一。1935年至1936年间,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团在西北大学驻军时,部分部队曾在大庙驻扎月余。1952年,西安市九区六乡的群众经常在大庙里举行大会,可见当时大庙的影响,名气之大。

1958年,在农业合作化时期,边家村与白庙村、何家村一起成立明星高级农业合作社,先后由巨笼人民公社、永宁人民公社管理。1959年,边家村与何家村、白庙村、吉祥村联合组成永明生产大队,隶属雁塔区曲江人民公社管辖。1965年边家村归属郊区管辖,1961年年底,四个村子又分别成立大队,边家村大队包括两个小队,200多户,400余人,土地面积约为300亩。2006年,边家村村民委员会正式更名为边家村社区。2009年开始城中村改造。

碑林区的大多数村庄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它们不仅是口口相传的文化符号,也是西安这个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一个古老的村名往往就是一段历史,记住了这段历史就是记住了乡愁,记住了我们的根脉。

鉴藏

凝水为礼 映照三千年文明的光辉

麻雪

青铜匜(yí)从悠远的周代踱步而来,携着三千年前庄重的回响。在那个重视礼仪的时代,匜作为水器,在祭祀、宴飨等重大典礼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彼时,在沃盥之礼中,宾客们正襟危坐,有人持匜倾水,清水自匜中潺潺而下,洗过宾客们双手的水,接入下方的青铜盥盆中,象征对宴飨的重视和对宾客的礼遇。

青铜匜,承载的不仅是清澈之水,更是礼仪文化的深厚底蕴;它不仅是一种实用器具,更是礼仪制度的生动体现。如今,在青铜器之乡宝鸡,出土和馆藏的精美盥器打破岁月的缄默,重现于世人眼前,引领我们回溯那被历史尘封的礼仪华章。

历史长河中的青铜匜

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其中的匜更是独具特色。1975年,



沃盥之礼

青铜匜

映照三千年文明的光辉

麻雪

岐山县京当乡(今京当镇)董家村青铜器窖藏出土了(夬 朕 zhèn)匜。如今,(夬 朕 zhèn)匜收藏于岐山县博物馆,是西周时期盥洗器的杰出代表。

岐山县博物馆馆长徐永卫介绍,(夬 朕 zhèn)匜是一级文物,通高20.5厘米、腹宽17.5厘米、腹深12厘米,腹底和器盖内有铭文157字,腹、盖铭文相连,虎头羊足、平盖宽流、粗颈直口、屈舌兽面,口沿下饰窃曲纹和一道弦纹,给人以狞厉威严之感。

(夬 朕 zhèn)匜被誉为中国的“青铜法典”,其铭文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篇诉讼判决书,内容涉及西周中晚期的法律判决等史实,对于研究西周法律史具有重大意义。从铭文中可以看出,被告者“(夬 朕 zhèn)”胜了,并铸就了(夬 朕 zhèn)匜来记录这件事。

2003年,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叔五父匜也备受瞩目。叔五父匜现藏于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其通高18.4厘米、通长36厘米,整体呈弧形,曲口直唇,前有宽流、流略上昂,后置龙首簋,下有四龙首足。口沿下饰窃曲纹,腹部饰瓦楞纹,盖上部饰凹弦纹和窃曲纹。

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院长陈亮介绍,叔五父匜内底铸有14字铭文“叔五父作旅匜,其万年子孙永宝用”,从其四足和底部有很厚的烟炱(tāi)可以判断,当时的贵族在天冷洗手时,不但用匜倒水,也可直接灌水。这为研究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实际使用提供了珍贵线索。

说到匜的实用性,笔者还了解到,1976年,扶风庄白二号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了5件放置有序的青铜器,其中也有匜。根据青铜器铭文研究显示,这是一个没落贵族的窖藏,匜也改变了用途,从行沃盥礼的水器,变成日常家用的烹饪器,甗(yǎn)、匜等铜器的周身或底部,留有一层厚厚的黑色烟炱,表明这批青铜器系当时正在使用的

生活器皿。

这些出土于宝鸡的青铜匜,不仅造型精美、工艺精湛,更因其铭文内容为研究西周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它们是宝鸡地区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沃盥之礼的庄重演绎

西周时期的礼仪制度渗透于当时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匜与盥盆配合使用,在当时主要用于重要场合的“沃盥之礼”。

《礼记》中记载:“进盥,少者奉盥,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描述的就是沃盥之礼的场景:宾客在行沃盥之礼时,由一位年轻人端着接水的盘,年长的人捧着装水的匜,宾客洗过手后,再给擦手的毛巾。

沃盥之礼不仅是一种清洁行为,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对自然、祖先的敬畏,以及对自身品德修养的重视。在西周的礼仪体系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在使用匜进行沃盥之礼时,也有着严格的规范和程序。

说过了“沃盥之礼”中的匜,再来说说其中用到的盥盆。从考古发现来看,与盥盆配合使用的盥盆在宝鸡出土不少。例如,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史墙盘、逯盘,这四个青铜盥盆出土于宝鸡,尤其受到关注。

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盥盆,记录了单(shàn)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12位周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重要史事,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盥盆与叔五父匜等青铜器为我们还原了西周时期沃盥之礼的庄重场景,让我们得以一窥当时礼仪制度的严谨与细致。

宝鸡地区出土的青铜匜是西周青铜器文化的典型代表。笔者还了解到,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匜的出土,如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多件西周至春秋时期青铜匜、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西周青铜匜、



(夬 朕 zhèn)匜

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春秋晚期青铜匜、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早期青铜匜等。它们与宝鸡出土的匜在造型、纹饰、铭文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各具地域特色。

从青铜匜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文化传播范围广泛,通过分封制、宗法制等政治制度,以及经济交流、人口迁徙等活动,促使西周礼仪文化得以在各地生根发芽。

从匜看西周人的命名

在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中,如叔五父匜、盥盆等,其铭文不仅记载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和礼仪活动,还为我们揭示了西周人的命名方式。

以前文提到的叔五父匜来说,“叔”在西周的称谓中,属于“伯、仲、叔、季”的排行。

陈亮在《后土吉金——青铜器之乡的国宝重器》一书中介绍,出土于眉县杨家村窖藏的叔五父匜,与窖藏出土的单五父盥盆的器主“单五父”以及盥盆的器主“逯”,应该是同一个人。“单”是其氏,“逯”是其名,“叔”是他的行辈,“五”是他的字。

在西周时期,人名往往与家族血缘关系、家族的期望和个人的品德修养或功绩等相关,通过名字可以明确家族成员之间的辈分和亲属关系,名字还常常与祭祀、礼仪活动相关。如,盥盆的铭文记载了单氏家族八代人辅佐西周12位周王的历史,遂作为家族的一员,其名字可能蕴含着家族对他的期望。

宝鸡出土的青铜匜,不仅以精美的造型和精湛的工艺展现了西周工匠的智慧和技艺,更通过其所承载的礼仪、文化以及命名方式等信息,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的西周礼仪文明之画卷。